

Digitizing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Digital Switchover

# 数字化中国

有线电视数字化的政治经济学

姬德强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 数字化中国

## 有线电视数字化的政治经济学

Digitizing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Digital Switchover

姬德强 著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数字化中国：有线电视数字化的政治经济学 / 姬德强著. —北京：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2016.3

ISBN 978-7-5043-7606-0

I. ①数… II. ①姬… III. ①有线电视—电视事业—数字化—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 IV. ①G22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1156 号

数字化中国：有线电视数字化的政治经济学

姬德强 著

---

策 划 刘 媛  
责任编辑 许珊珊  
封面设计 海燕·贝壳悦读

---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pt.com.cn  
电子信箱 crtpt8@sina.com

---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16 (千) 字  
印 张 15.5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978-7-5043-7606-0  
定 价 45.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中国的愿景应该是经由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将西方甩在身后，这将是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和不可通约的技术发展道路。在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中是没有社会主义道路的。”

——达拉斯·斯迈思 (Dallas Smythe)，《自行车之后，是什么?》<sup>①</sup>，1973 年

---

<sup>①</sup> [加拿大] 达拉斯·斯迈思著，王洪喆译：《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技术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开放时代》，2014 年第 4 期，第 102 页。

## 跨越十字路口，让传播研究迈向社会前沿

胡正荣

如果从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访问大陆算起，中国的传播研究或者传播学已经步入而立之年，和本书的作者基本同龄。如果做更长远的学术史追溯或者说知识考古，中国的传播研究则大体可以溯源到 20 世纪初，在维新救国和以西方为朝向的启蒙主义的历史脉络中，受到来自欧美等国家内部日渐兴起并成熟的社会学和新闻学的影响<sup>①</sup>。不管在何种历史语境中，传播研究都是某种外来知识与本土经验的“咬合”（articulation），从而产生了多年未断的“本土化”之争。

对施拉姆来说，传播学的“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是其他成熟社会科学在触及媒介或传播问题时的馈赠，是一个十足的“十字路口”；而对中国传播学者来说，在理论引介与本土经验和知识的提炼

---

<sup>①</sup> Hu Zhengrong, Ji Deqiang & Zhang Lei (2015), *Building the Nation—State: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in China*, in Peter Simonson and David W. Park (eds.),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Routledge; 以及姜飞：《中国传播研究的三次浪潮——纪念施拉姆访华 30 周年暨后施拉姆时代中国的传播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 年第 4 期；刘海龙：《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 年第 1 期，等相关论述。

之间，也存在着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以引进理论为基础的传播学的建制是保证学科独立发展的前提；另一方面，“内卷化”（involution）<sup>①</sup>的现实却将传播学和传播学者隔离在跨学科的社会前沿之外<sup>②</sup>，造成了某种自娱自乐的局面；更重要的是，在纷繁复杂的传播与社会现象面前，传播学的解释力并没有因为学科建制化的成熟而表现得游刃有余。于是，中国传播学未来的发展就需要寻找新的地图和路线，从而跨越充满瓶颈与迷雾的“十字路口”。

那么，这个新的路线图是什么？应该是从传播学的问题意识和学科敏感出发，去发现具有社会意义的传播现象；接下来，就需要动用多种社会理论、路径和方法，来对这一传播现象进行脉络化，再就不同维度进行解剖；最后，回归对社会理论的增殖。

根据这一标准，姬德强的这本专著无疑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在长达十年的观察、参与、调查和思考的基础上，《数字化中国：有线电视数字化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就一个遍及全球和全中国的传播现象，提供了不同于单一技术或市场路径的多角度思考。在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框架内，作者以比较扎实的案例研究为基础，力图结合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分析，在全球信息与传播技术、资本流动以及国家政策的背景下，讨论这一“转换”过程的多重社会维度，并最终回归到有关技术与政治等根本问题的讨论。可以说，以“有线数字电视”为切入口，作者打开了一扇社会研究的大门。从技术与经济、政治、社会 and 神话的互动中，本书提供了理解变革中国内部权力关系的一把虽然粗糙但颇具扭力的钥匙。它所打开的不仅是中国有线电视数字化十余年，似乎已经有些尘封的档案，而且是传播或媒介研究与其他社会理论之间的对话之门，尤其是本书所努力运用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在这个意义

<sup>①</sup> 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书城》，2014年第2期，第62页。

<sup>②</sup> 廖圣清等：《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十五年：1998—2012》，《新闻大学》，2013年第6期。

上，这本书将可能成为其他学科学者了解传播学，甚至是广播电视研究的一扇窗户。

另外，学术需要沉淀。这不仅是因为历史复杂性的展开往往是需要时间的，而且人们的认识也是需要时间的，更是因为，社会领域的真理往往是颠扑不破的。本书所讲述的历史故事，以及所讨论的社会和道德议题，恰恰告诉我们，不管技术如何更替，我们面前的世界如何瞬息万变，驾驭一个社会前行的根本动力，仍然是那些最为基本的权力要素，比如资本、阶层、国家和道德诉求，等等。如此看来，本书研究对象的延迟性，与现实之间的异步性，反而为我们更为全面和深刻地思考“数字化中国”的复杂面向和深层矛盾，提供了空间。这也符合本文对于“迷思”的批判式思考，那就是：“技术真正的权力并不会在迷思盛行的时期展现出来，反而是在平淡之后。”<sup>①</sup>

总而言之，本书对于束缚着中国传播学未来发展的“十字路口”的跨越，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尝试，也为传播研究迈向社会前沿付出了点滴但是可贵的努力。在重思传播学的知识谱系、社会意义和学术正义<sup>②</sup>的大背景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传播学者，尤其是青年传播学者，将大有可为。

2015年12月12日

于中国传媒大学

---

<sup>①</sup> Vincent Mosco (2004),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The MIT Press, p19.

<sup>②</sup> Yuezhi Zhao (2009), "Rethinking Chinese Media Studies: History, Political Economy, and Culture" in Daya Thussu (ed.), *Internationalizing Media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 未竟的中国数字革命，希望的批判学术田野

赵月枝

虽然1980年代初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访华被认为是中国传播研究的开端性事件，我非常欣喜地看到，本书扉页上那句发人深省的、具有画龙点睛意味的引言，出自加拿大批判传播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1970年代初访华后，所写的《自行车之后，是什么》这篇中西方学术交流史上的奇文。本书作者姬德强是改革开放和中国传播学学科建制的同龄人，而我则是跨越了共和国前后三十年的“八十年代新一辈”。当他还在幼儿园时，我已带着施拉姆一本名著的中译本出国留学了。然而，具有戏剧性的是，国家公派留学计划和个人决定偏偏使我到了斯迈思所在的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简称SFU），而他也郑重地把《自行车之后，是什么》手稿给了初来乍到的我。

因被斯迈思的学术洞见和他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世纪之问”所吸引，在《手机之后，是什么？中国“数字革命”的社会层面再认识》<sup>①</sup>

---

<sup>①</sup> 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8月版，第243—255页。



一文中，我提出了超越信息与传播技术，从动态的社会和多阶级能动主体的角度，思考中国“数字革命”的开放式未来的理论框架。“技术为人民服务”是这一框架的道义基础和价值归宿，突显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技术政治方面的根本区别。从方法论和学术政治角度来说，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媒体中心主义和技术决定论，从历史和经验出发找寻“数字革命”在转型中国社会的多样化实践，不仅是进行本土传播理论创新的不二之选，而且是坚持辩证唯物史观，勿忘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和大众民主许诺，避免割裂共和国前后三十年历史的必然要求。

延续这一理论框架和方法论路径，姬德强的这本专著以“有线电视数字化”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特征的有线电视系统，如何在快速商品化和维持公共服务之间摇摆前行的过程。在技术迷思与市场理性的所谓专业主义视角之外，这本书另辟蹊径，从批判政治经济学传统出发，探析了技术、国家与资本在转型中国社会如何重构传播权力这一更为基础的问题。

从内容上来说，本书不仅梳理了围绕“数字化”而形成的霸权式意识形态叙述，而且进一步探究了“数字精英”阶层的形成过程，以及有关社会主义公共电视系统的集体记忆遗产，如何参与型构着数字化的未来。可以说，在学科分化、领域细化和当下“去政治化”的学术政治环境下，这本书尝试着我所提出的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综合分析路径，对中国的传播与社会研究，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

值得提起的是，这个研究的源起和进展得益于中国国家的留学政策和我本人在中加两所大学的教职<sup>①</sup>。六年前，姬德强在中国传媒大学读博期间，得到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赴 SFU 传播学院，跟随我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适时的 SFU 虽然在学术上已经不断多元

<sup>①</sup> 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和西蒙菲莎大学加拿大国家特聘教授。

化，但斯迈思的学术遗产依存，批判的传播研究传统仍然占据主流。在我的推荐下，姬德强辅修了包括技术哲学和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内的重要课程；在我的读书小组里阅读了有关中国社会，技术与资本、劳工，以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典文献。如果说，有线电视数字化的问题意识来源于他在中国的观察和体验，那么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 SFU。当然，这里的“内外之别”并不是我们常说的“东西之分”，原因有三：其一，正如斯迈思与中国的不解传播学术渊源所昭示，中国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早就影响了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探索，而前者更是 20 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其二，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超越了“西方中心”的世界史观，而将分析重心落在阶级和种族为代表的基础性范畴；其三，作者坚守了中国本土历史和多样化的传播经验在分析中的核心位置，在吸收国外理论的同时，保持与本土经验和地方知识的对话。这不仅丰富了我近年来所致力于发展的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框架，更强化了我坚守传播理论扎根中国历史与社会现实的信心。如果当年我曾影响过他，现在是他以扎实的研究、犀利的观察和深刻的分析教育了我。

对本书作者的学术之路而言，我希望这本书不是（即便是一个阶段性的）终点，而是一个起点。因为中国的“数字革命”不会因为一个媒介系统的数字化转换的完成而终结，更广泛的、多样的、围绕传播资源和话语权分配的对话乃至斗争才刚刚开始。

一场未竟的数字革命正向作者这辈的年轻学者敞开研究的大门。正如我在《中国的挑战：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刍议》一文中所提出的，这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sup>①</sup>，因为“研究中国传播的学

---

<sup>①</sup> 赵月枝：《中国的挑战：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刍议》，《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 年第 28 期，第 173 页。

者们已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而有全球视野和中国社会历史深度的学者也正在重新整合中外批判传播思想和激进民主传播实践的资源，开拓批判研究的新视野。工作才刚刚开始。”<sup>①</sup> 在这一充满荆棘也不断有丰收果实的批判学术希望田野上，“如何定位自己与社会变革以及媒体民主化主体间的关系？又如何选择自己的学术主体性和确立自己的学术立场？”<sup>②</sup> ——是我们耕耘过程中面临的持续挑战。我为能与姬德强这一代年轻学者一起探索和前行而备受鼓舞。

于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学

2016年1月1日

---

① 赵月枝：《中国的挑战：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刍议》，《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年第28期，第173页。

② 来源同上，第166页。

# 目 录

---

序一：跨越十字路口，让传播研究迈向社会前沿·····	胡正荣	1
序二：未竟的中国数字革命，希望的批判学术田野·····	赵月枝	5
绪论：数字化中国：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中的有线电视数字化 转换·····		1
一、作为一个社会范畴的“数字化”·····		18
文献扫描·····		20
“数字化”与“数字神话”·····		25
数字化的社会语境：国家与社会·····		29
二、有线数字电视，从文化分析到政治经济学·····		35
为什么选择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		35
中国的有线电视：从共用天线系统到有线数字电视·····		40
研究问题与分析主线·····		47
研究概述：从文化分析到政治经济学·····		50

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有线电视数字化的意识形态支柱·····	54
中国社会的主流叙事结构·····	58
数字化与现代化·····	60
数字化：科技定义的“美好”生活·····	72
数字化与市场主义·····	76
数字化与公共服务·····	79
数字化与意识形态安全·····	82
四、资本、权力与阶层：有线电视数字化的“资本化”逻辑·····	87
资本化·····	91
数字精英：有线电视数字化的主导阶层·····	106
市场与威权：有线电视数字化的新自由主义脉络·····	115
商品与劳工：全球数字资本主义中的中国有线数字电视·····	129
公共服务：中国有线数字电视的历史语境与遗产继承·····	144
重读：精英主导的部门之争、城乡差别和媒介角色二元论·····	157
五、多样的数字化：社会主义广电与有线电视数字化的群众实践···	174
社会主义历史与传播演进的多样化路径·····	176
“数字化”的多重解读·····	185
传播技术革新与社会变革：社会主义遗产与民主政治·····	194
六、再议“技术与社会”的二元论·····	197
从技术神话到社会理论·····	197
社会价值的可选择性与重置·····	200
研究的意义、创新性 with 局限·····	202

附 录 .....	205
谁的广场谁的舞 .....	205
为什么我们不能怪罪广电总局 .....	207
“下流蓝翔” .....	209
汉江与韩流 .....	211
“分屏时代” 的到来 .....	213
明星出轨的经济学 .....	215
幸福的生活从哪里来 .....	218
大数据并轨：电视产业的转型与未来？ .....	221
主要参考文献 .....	226

## 绪论：数字化中国：国家、资本与社会 关系中的有线电视数字化转型<sup>①</sup>

作为一个历史性研究，本书希望展现的是一幅转型中国的多维的社会图景。

关注以“青岛模式”为代表的有线电视的数字化转型已经十年有余，这一看似单一的技术革命，在十年的时间里却给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社会实践土壤。其中的技术迷思、市场驱动、政策争论、部门区隔、地区差异、劳动力转型等等，已经在实践层面超越了“媒介中心主义”的研究框架，诉诸跨学科的知识谱系与学术努力。

从具体的实践层面来看，十年之后，曾经喧嚣于政策、市场与技术讨论中的转换“模式”之争逐渐归于沉寂，取而代之的是更具地方性的转换实践，以及对转换中涌现的各类技术与市场问题的应对。与曾经占有主导地位的专业话语不同，本书以历史的视野，从对以“青岛模式”为代表的转换实践的批判式解构出发，着重分析国家和资本

---

<sup>①</sup> 本文原载《新闻大学》2015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新闻与传播》2015年第5期全文转载，收入本书后有所修改。之所以将本文作为全书序言，主要是因为这篇文章既是对过往研究的总结，也是对未来新的研究路径的开启。作者希望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中继续挖掘中国“数字革命”的社会意义，在关注丰富的传播实践基础上，由下而上进行理论创新。

在形塑这一模式，以及在相关的迷思中所发挥的重要结构性作用；另一方面，将由“青岛模式”及其全国推广所展开的围绕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的多样化“社会过程”称作“青岛实践”。这一未竟的社会过程不仅继续受到技术民族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国家力量，以及寻求投资报偿和增长的各类资本力量的制约，也逐渐受到多种“社会保护运动”及其对国家规制的诉求的影响，使得中国的数字电视道路不仅具有特殊性，更具有传播民主的普遍性。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多重角色值得特别关注。

十年之后再议“青岛模式”，既是对历史研究空白的补足，也是对当下未竟的数字革命的重新检视。

### 十年，从“青岛模式”的淡出说起

2003年是原国家广电总局设定的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元年<sup>①</sup>，根据其公布的“四步走”时间表，2015年将是预定的全国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完成之年。过去的11年中，中国的有线数字电视经历了从小规模实验到大规模整体转换的创新扩散过程。截至2015年5月底，我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达到19289.9万户，有线数字化程度约为83.51%，整个数字电视转换进入中后期<sup>②</sup>。

在这个首先是由上而下的推广过程中，涌现出包括“青岛模式”、“佛山模式”和“苏州模式”等在技术层面有效完成区域内数字化转换目标的做法或实践，尤以被推广至全国的“青岛模式”（整体平移）为代表；但相关的分析和研究多从政策、市场和技术的视角出发，寓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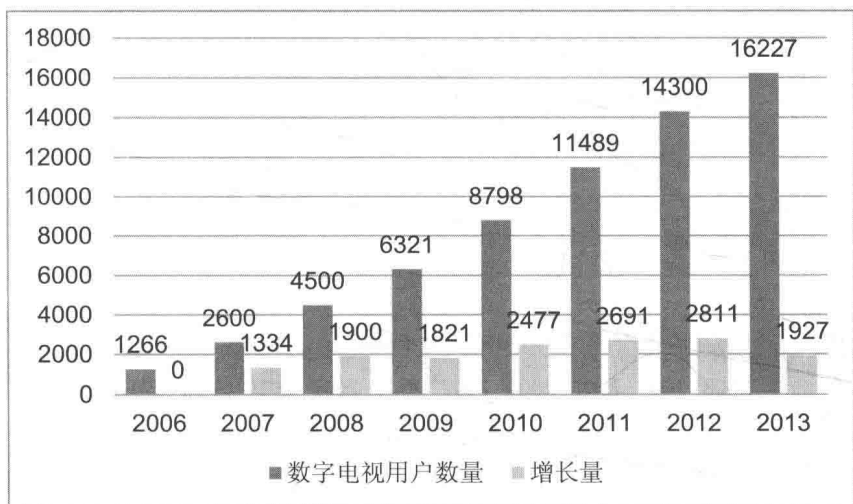
---

① 虽然经历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各种实验，但直到2003年，伴随着国家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时间表的公布，中国的数字电视时代才真正启动。参见：《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过渡时间表》，国家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网站，<http://www.sarft.gov.cn/articles/2003/05/08/20070908214928360717.html>

② 《5月底中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达19289.9万》，科讯广电网，<http://bc.tech-ex.com/2015/dynamic/65146.html>



这一三维一体的“专业”逻辑中，尚未从更广义的“数字革命”以及数字化转换的多重社会历史背景和多样化的参与主体等角度，勾连技术变革与“改革开放”所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力结构转型之间的复杂关系。



全国数字电视用户增长情况<sup>①</sup> (单位：万户)

就研究的数量和年度变化而言，对中国知网（CNKI）简单的搜索发现，中文期刊文章中有关“有线数字电视”的部分在2003—2007年间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之后缓慢下降，直至2010年比2009年减少200篇左右，随后小幅增长至今。有关“青岛模式”的部分在2004年（也就是原国家广电总局决定推广这一模式的年份）达到最高的55篇，接下来的近十年中缓慢下降至2011—2013年的年均个位数水平。总体而言，在中文期刊文章中，2007—2009年是有线数字电视研究最热的年份，而2004年是“青岛模式”被谈论最多的年份。总的趋势是，随着

<sup>①</sup> 《2013年我国广播电视行业发展研究报告》，慧聪网，<http://info.tele.hc360.com/2014/04/030855459136-all.shtml#m3>